

<<读中文系的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读中文系的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3947803

10位ISBN编号：7503947802

出版时间：2010-12

出版时间：文化艺术出版社

作者：林文月

页数：20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读中文系的人>>

### 内容概要

这本书共收二十二篇长短不同的文章，作者把它们分为三类：第一部是分文随笔类；第二部是赏析评论类；第三部是近年来翻译《源氏物语》的相关文章。

作者之所以把这三种类型不同的文章收在一起，乃是因为尽管内容性质有别，却都是读中文系的人始终努力用功的三个方向。

每个方向又与在台大读中文系的那一段日子有深厚而又温暖的关联，因此书名也已《读中文系的人》命之。

## <<读中文系的人>>

### 作者简介

林文月（1933年 - ）

台湾彰化县人，曾执教于台湾大学，担任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、史丹福大学客座教授、捷克查尔斯大学客座教授，身兼研究者、文学创作者、翻译者三种身份。

她的散文《京都一年》《读中文系的人》《午后书房》《交谈》《拟古》《饮膳札记》等作品在台湾影响很大，多次获奖，部分篇章还被编入台湾语文教材；翻译的《源氏物语》目前为华语世界最优秀版本。

曾获时报文学奖、台北文学奖、中兴文艺奖等文学奖项。

<<读中文系的人>>

书籍目录

第一部 偷得浮生二日闲 生日礼物——为蔚儿十六岁生日而写 过年&#8226;萝卜糕&#8226;童年  
说童年 读中文系的人 马兵营之行 重游神保町 一本书 终点——为《源氏物语》完译而写  
第二部 《诗经》“国风”中所表现的我国古代妇女 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观 陶渊明、孟浩然与王  
维 读晏殊的几首春秋之词 “悠然见南山”与“池塘生春草”——兼谈古典文学欣赏的一种态度  
读《台湾诗荟》的广告启示 平冈武夫与《白居易》 简评海涛著《中国文学讲论》 James Robert  
Hightower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第三部 漂洋过海到东瀛的中国爱情典范 我怎么开始翻译《源  
氏物语》 《源氏物语》简介 物语的世界 《源氏物语》中的和歌 日本平安贵族的一生行事 后  
记：一个读中文系的人

## &lt;&lt;读中文系的人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说童年 “咦？”

你的台湾话为什么讲得这样好？

”这是我跟人用台语会话的时候，常听到的恭维。

但是，如果我告诉他：我本来就是台湾人，是一个道地地道的台湾人——父亲是彰化县北斗镇人，母亲是台南市人，别人又会惊讶地重新打量我说：“不像嘛，一点儿都不像！”

”我这个年纪的本省人，多多少少都还记得一些日本话，有时候我跟日本人或只会说日本话的人（譬如日本华侨）用日语会话，也往往会听到：“你的日本话很漂亮，完全没有台湾腔。”之类的恭维。

我不知道一个人应该长得怎么样才像台湾人，可是我知道别人说我台湾话讲得不错，正表示我这个台湾人讲出来的台语实在不十分标准；人家以为我不是台湾人，却能说一口“流利”的台语，所以才会如此夸奖我。

至于说到我的日语不带台湾腔，则又可能意味着我另有一种别的腔调也说不定。

这些话语我经常听到，所以平时总是不置可否笑笑而已，若要解释起来，实在有些麻烦，势必要牵涉到我的童年和我的生长背景。

然而，前些日子，与一些朋友谈及此事，竟觉得有些情绪激动起来，想要温习一下逝去的童年，同时也借此给自己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和答案。

别人对我产生那种奇怪的印象，其实是有缘由的。

我虽然是一个道地地道的台湾人，却不是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。

我出生在上海，我家八个兄弟姐妹当中，除了弟弟因避民国二十六年的“上海事变”而于东京出生外，其余七人都诞生于上海。

双亲很早便从台湾迁居于上海。

抗战结束以前，父亲一直任职于日本“三井物产株式会社”的上海支店，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，先后都在上海市江湾路的家生长。

当时的上海，四分五裂。

我们住的是日本租界闸北地区。

那里面的日本人占着很大的人口比例。

他们有许多就学年龄的子女，所以设有日本小学多达九所，其中一所专为朝鲜人而设。

那时的台湾人，依据马关条约，也算是日本人，但是闸北地区的台胞子女大概没有朝鲜人多，因此日人并没有特别为我们开办一个小学，却令我们按学区划分，与日本儿童共同上学。

我八岁时，先进入“第一国民学校”，次年因学生人数增多，新设立“第八国民学校”，便与附近的日本学童们重被分配到那所新开的小学读书。

直到抗战胜利，我小学五年级以前的教育，都是在那里接受的。

我家邻近的台湾人不多，所以当时“第八国民学校”，全校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台湾学生。

老师和同学总是以奇特的眼光看待我们。

我们因为从小与日本孩童一起长大，语言习惯都颇为日本化；父母则因为我们还幼小，也就没有灌输我们台湾如何割让给日本的历史，所以我们根本无由了解何以自己与别的同学有差异。

我们在家里大部分是讲日本话，跟父母偶尔讲极有限的台湾话，和娘姨（上海人称女佣为娘姨）则全部讲上海话；可是在外面，我们绝不说台湾话和上海话（当时在闸北的台湾人都不得不如此）；即使这样，大家还是以奇特的眼光看我们。

记得那时最愁学校举行母姊会一类的活动，因为我的母亲在那些日本妈妈们当中总是显得十分与众不同，尤其她把那一头长发在颈后挽一个髻，那是一般上海中年妇女的标准发型，没有一个同学的母亲梳那种头发。

每回母亲来学校，我总是尽量躲开她，很怕她同我打招呼讲话。

可是，偏偏有时校方会邀请家长们进入教室参观上课情形。

有些同学的母亲会穿一身华丽的日本和服来，那真让做子女的感到很光彩；可是，母亲的来临，却徒

## &lt;&lt;读中文系的人&gt;&gt;

增我的困窘，因为同学们会指指点点，猜测那是谁的妈妈？

使我羞愧得几乎想冲出教室门外。

虽然我是班上唯一的台湾人，平常这个差别还不太明显，只有在母亲来校时，就像用放大镜照射似的，我会变得十分怪异奇特起来；而且这种事总是余波荡漾，使我好几天都成为大家窃窃私议的中心。

小时候，我相当好强用功，品行也优良。

做一个小学生，最高的荣誉莫过于当班长，因为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当班长。

父亲勉励我们时，也总以当班长期许我们。

那时很流行在学校操场上溜冰。

溜冰鞋卖价很贵，我常常梦想拥有一双自己的溜冰鞋。

父亲答应说，如果我能荣任班长，便买一双送给我做奖品。

有了这个目标，我更加努力读书，而我的成绩也果真超出班上所有日本同学之上；然而那位日本男老师却只让我当副班长，因为我是台湾人。

我也就始终没法子得到一双发光的溜冰鞋了。

战争快结束时，盟军的飞机常来轰炸上海的日本租界。

有时一天之中会听到好几次警报，得要躲好几次防空壕。

当时闸北的各个日本学校都有日军驻扎着，所以防空壕里经常都会有日本兵与学生老师混杂在一起的情形。

有一回，我们在防空壕里躲避许久，警报不解除，外面却无甚紧张气氛。

无聊之余，有一个年轻的二等兵便逐一询问学童们的籍贯以解闷。

有人来自东京，有人来自大阪，也有来自九州岛乡下地方的，轮到我吞吞吐吐说是台湾人时，那个二等兵竟愣住了，许是他一时弄不清楚这个陌生的地名吧；继而想起什么似的，他的眼神忽然变得很奇怪，表情变得很冷漠；顿时，先一刻那种“他乡遇故知”的热烈气氛完全消失了。

我至今犹记得那个日本兵脸上的表情变化，也一直忘不了自己当时的屈辱和愤怒。

“台湾人有什么不好？”

台湾人和东京人、大阪人有什么两样！

”我心里很想这样大声叫喊，但是我不敢；事实上，我只是红着脸低下头而已。

日本小学生往返学校都排队走路。

我们经常会在路途上遇见中国孩童；双方总是像仇敌似的，往往一方叫喊：“小东洋鬼子！”

小东洋鬼子！

”，另一方又叫喊：“支那仔！”

支那仔！

”，气氛紧张时，甚而会互相捡地上的小石子乱扔。

我也曾经跟着喊过“支那仔”，也曾经对中国孩子投过石子。

因为我那时以为自己也是日本孩子。

有一次放学途上，走过每日必经的“六三园”，那是一个整洁可爱的小公园，我们看到一个日本宪兵，不知何故，正对一个中国孕妇拳打脚踢。

我们都止步，好奇地围观；没有一个人同情那个哭叫哀嚎的女人，大家反而欢呼拍手。

当时大概是认为中国人——无论男女老幼都是坏人，而日本人全都是好人的吧。

战争接近尾声时，局势相当紊乱。

各级学校都被日本军队占用，我们也就不再上学了。

邻居们各组小团体，将附近的学童们集合在一起，使大家每天仍有几小时见面的机会；其实，那时已经没有心境读书，这种安排，无非是由家长们推选代表，轮流看顾精力旺盛而又调皮捣蛋的孩童们罢了。

我和弟妹便与“公园坊”、“永乐坊”的日本孩子们一处嬉戏着，并不怎么费心去理会大人世界里所酝酿着的事情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

我们那一区的日本居民，有一天被召集到广场上。

## &lt;&lt;读中文系的人&gt;&gt;

一个表情肃穆的里长模样男人叫大家安静，因为无线电台要广播“天皇陛下”的重要圣旨；他并且要大家低首恭聆。

不多久，日皇沉痛地宣布日本战败，向盟军无条件投降。

先是一阵骚动，接着，我听见此起彼落的啜泣声，后来又逐渐变成一片哀号声。

男人在哭，女人在哭；大人在哭，最后，孩子们也在哭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发觉自己竟也跟着大家好似很悲伤地哭起来。

接着而来的是一片混乱的日子。

日本租界里天旋日转。

那里面的日侨，一下子从天之骄子，变成了丧家之犬，开始匆匆忙忙迁返他们的家乡。

有些上海人却乘势搬运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家具物品等，甚至还有一些不肖之徒冲入尚未迁走的日人住宅里，肆意抢劫。

我和弟妹们躲在二楼浴室的小窗口前，好奇地偷窥街上紧张而混乱的景象。

我家门口插着一面簇新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，所以很安全。

不过，父母还是不准我们出去。

从大人口中得悉：我们不再是日本人，我们现在是中国人了；我们没有打败战，我们是胜利了。

其实，我们并不明白这个天大的变化。

我们真的来不及明白这个道理。

然而，实际上我们的安全也没有维持多久。

等日本人走光后，有些地痞流氓开始转移注意力到我们头上来。

他们说我父亲曾在日本人的“三井”做事；骂我们是“东洋鬼子的走狗”。

气氛越来越紧张。

一天夜里，父亲和母亲去找一位住在法租界的朋友，而把我们暂时交给一位年长的堂兄照顾。

第二天中午，母亲单独回来。

她不许我们探问父亲的情形。

两三天后，有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少年闯入我们家来。

那个男人手中有一支手枪——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的真手枪。

当时母亲正好购物回来，手里提着一些果物。

见了那两人，她吓得双手发软，整袋东西撒了一地板。

我们也都很骇怕，可是没敢叫出声来。

大家手拉手，紧紧的。

陌生人命令我们只准带卧具和简单的日用品，把我们全家大小赶到楼下的客厅，楼上所有的房间都被他们用长长的封条封住了门。

以后的事情，我记不大清楚。

那两个人好像大声而严厉地用上海话说了一些恐吓的话才离去。

大约有数日工夫，我们一家人委屈地挤在客厅里起居。

母亲的脸色十分凝重，脾气也变得焦躁起来。

我们只好小心谨慎，以免挨骂。

堂兄忙进忙出，似乎负责联络什么事情，时而与母亲轻声商谈；我们也不敢去偷听。

不过，我和弟妹们常乘大人不注意时，溜上楼去看看那些紧闭的房门，和贴在门上的封条。

真奇怪，自己的家，却有一种陌生而神秘的气氛。

但说实在的，我们当时并不觉得怎么难过，反而感到异常兴奋刺激，仿佛自己变成侦探小说里头的人物一般。

过了一星期光景，那几张写着潦草毛笔字的封条被堂兄撕去了。

父亲也从法租界回家。

事情究竟是如何解决的呢？

我们小孩无由得知；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。

后来，汤恩伯将军来到上海。

## &lt;&lt;读中文系的人&gt;&gt;

上海市的台籍居民组织了一个同乡会，派代表到坐落于北四川路的前日本海军陆战队，去拜会汤将军。

他们要物色一个十来岁的女孩任献花的角色。

大概由于父亲也是代表之一，所以我被选上了。

那天一清早，父亲一再提醒我献花的礼仪。

战战兢兢完成任务后，汤将军好像还笑着摸摸我的短发。

而当时我身上穿的，仍是那一套整洁的日本小学制服呢；只是，胸前没有佩带“第八国民学校”的徽章罢了。

日本人撤退后，上海的“三井”自然也解散关闭了。

我的舅舅因为参加政府收复台湾的工作，于一九四五年十月，先行返台。

舅母带着表弟从重庆来到上海。

姨母一家人也自南京来沪。

三十五年二月，我们三家人共乘一船回台湾。

离开上海时，天寒地冻。

咖啡色的扬子江上，飘荡着一层冰凉凉的雾。

母亲身上穿着虎皮大衣御寒，我们大家也都穿好几件厚毛衣。

可是，船靠妥基隆码头时，却见一幅热天景象。

有些光着脚的男孩子背着木箱，在叫卖“枝仔冰”。

岸上的人全都讲台湾话，用好奇的眼光瞪视甲板上的我们；而我们对这个陌生的家乡，也觉得十分新鲜兴奋。

从基隆乘坐舅舅来迎的汽车到台北，路途虽远，我们却丝毫不觉得疲倦。

对于生长在上海的我来说，此地抬头可见的青翠山峦，毋宁是颇具吸引力的，而三线道上成排的大王椰，迎风飞舞，则更是前所未见，简直充满异国情调。

“这就是我的家乡吗？”

“这是我的家乡！”

我心里反复不停地自问自答。

我终于回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，回到一个与别人都无差别的环境了。

最高兴的事，莫过于此。

然而，我当真不再与别人都无差别了吗？

事实却未见得如此。

把家安顿后，父母最操心的便是我们几个孩子的学校了。

初来时，我们住在东门町（即今仁爱路一带），弟妹们都进入“东门国小”，没有问题；唯独我最麻烦，因为那年我理当读六年级，而附近各小学的六年级生都已毕业升学（大概是光复之初，仍沿用日本学制，采春季开学的办法）。

几经打听，始知只有在万华的“老松国小”还有六年级班。

我只好每天从东门步行，经过被轰炸而尚未修复的总统府，再穿越铁路，去那所小学读书。

路程远，已令我疲倦厌烦，而陌生的环境，语言的隔阂，更使怕羞的我视上学为畏途。

当时“老松国小”的六年级只有两班：一是男生班，一是女生班。

头一天去上学，级任老师特别向班上的同学介绍，说我来自上海，希望大家待我友善。

于是，下课后，所有“友善”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

同学们说的台湾话，我听不懂，她们说的日本话，又带浓重的台湾口音，同样使我似懂非懂。

那种年纪的女孩子特别好奇，她们对于我这个唯一来自内地的台湾人，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奇怪问题，又对于我的一举一动都特别注意品评，就好像我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似的。

那时候，本省人喜欢叫外省人为“阿山仔”——表示来自唐山的人，同学们便管我叫做“半山仔”。

我虽然是在上海长大的“半山仔”，但受的是日本教育。

我会讲上海话，可是不会说国语，也不认识多少中国字。

光复之初，本省籍的国文老师多数是前一天去国语补习班，第二天便来教学生，而上课时则用台湾话



<<读中文系的人>>

解释国语。

这使我的学习十分困难，何况我到班上时，别的同学已经大体学会注音符号，而我却连勺勺口口都不认得。

上学不久就逢考试，这真叫人难堪。

我回家请求母亲让我休学，母亲说什么都不答应，百般劝慰我。

犹记得第一次在“老松国小”考国文，成绩是三十分，我从来没有考过这样低的分数，也真成了难忘的回忆呢。

以后的日子，我加倍努力读书，同时也努力跟大家学习带北部腔调的台湾话。逐渐的，我和别人的差距减少到最低限度；这才感觉自己真正融入了生活的环境里。

半年以后，北二女中招考新生——那年秋季班，北一女中没有招生，我幸而录取。

我想，一个人的童年应止于中学生活的开始，所以我童年的回忆纪实，也该在此结束。

其实，跟许多人一样，我的童年也有不少温馨甜蜜的故事，只是较别人多了一种复杂的彷徨感。这是由于我生在一个变动的时间里，而我的家又处在几个比较特殊的空间里；时空的不凑巧的交迭，在我幼小的心田里投下了那一层浅灰色的暗影。

那种滋味实在不好受，到现在都无法彻底忘却。

不过，我知道自己已经迈过了那一层浅灰色；一切甜蜜的与悲辛的，都已经随时光的流转成为往事了。

我庆幸自己毕竟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环境，以及不必再感到彷徨的现在。

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一九七七年八月

<<读中文系的人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能让“大学精神”代代相传的，不是政府的文告，也不是校长的演讲，而是无数像《读中文系的人》这样的好书，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故事与人物。

——陈平原

<<读中文系的人>>

编辑推荐

林文月的散文淡而有味，从自我对世情的慧心体察而发，用细致闲适的笔调描述生活的滋味，自成“似质而自有膏腴，似朴而自有华采”之风格。从上海江湾路的童稚岁月到台大校园里的学院回忆，让读者们看到一个读中文系的人逐渐成长的过程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